



艾  
芜  
近  
作



---

# 艾芜近作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一九八一年·成都

封面设计：陈世五

### 艾芜近作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5 字数147千  
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200册

---

书号：10118·418 定价：0.74元

## 出版说明

收在本集的三十多篇文章，都是作者近年写下的文艺回忆录和创作经验。他以抒情的笔调，朴素的语言叙述了自己在缅甸、上海等地从事文学活动的艰苦历程。又以真挚的情感，怀念着文学道路上的老师、战友。在这些短文里，可看出作者为实现自己的愿望、理想所表现的坚毅不拔的精神。有志好学的青年，都可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 目 录

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1
漫谈三十年代的“左联”·····	17
关于三十年文艺的一些感想·····	24
关于“国防文学”问题·····	39
我在仰光的时候·····	46
悼念华侨诗人翻译家黄绰卿·····	67
你放下的笔，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来·····	80
悼邵荃麟同志·····	84
回忆周立波同志·····	91
怀均吾同志·····	97
在林如稷同志追悼会上的致词·····	100
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	103
红艳艳的罌粟花·····	106

还乡记·····	125
鞍钢啊，我回来了·····	152
云南在我的心地上播下了美好的种子··	158
地貌的青春·····	161
都江堰的神话故事·····	167
笑话一则·····	171
谈短篇小说·····	173
谈文艺刊物·····	181
漫谈科学和文学·····	184
两件往事的启发·····	188
繁荣文艺必须肃清封建流毒·····	191
对目前文艺的一点感想·····	198
《艾芜短篇小说选》重版题记·····	205
《南行记》重印题记·····	213
《夜归》前言·····	217
《丰饶的原野》前言·····	220
《桂花村的孩子们》序言·····	224
关于《诗经》中的一些“行”字的探讨····	227

## 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我参加左联前前后后的情形

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太原号，行驶在大雾茫茫的太平洋里，常常和对面将要开来的轮船互相鸣着汽笛，以免发生相撞的事故。轮船是从厦门开到上海去。我虽然是一位旅客，却是被英帝国主义从缅甸驱逐回国的，心里也象有雾似的，不晓得今后怎么生活。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去各个书店看看，自然更要看看光华书局。很使我高兴，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去要本刊物和稿费，却象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宿费和伙

食，一个月九元钱。缅甸的华侨和文化界友人，曾送了一笔生活费，尽管在厦门已用得差不多了，小旅馆住一两个月，还将就可以对付。我一天到晚没事做，就坐下来，写些东西。不两天，就有人来敲门了。一个一身穿得相当好的汉子，走了进来，在我面前，放下一本簿子，向我说：“你是读书人，请捐点钱给我们图书馆，不要多，一块洋钿。”还翻簿子指点说：“你看，有的人还五块十块的捐啊！”我见他一脸凶相，不是正派人。我也知道上海流氓多，最好不要同他发生纠纷，我看不出点不行，于是给他一元钱。他出门后，还同那些茶房挤眉弄眼的。我觉得不能住下去了，恐怕还会有好多麻烦发生。

我幸好还想起了一个熟人，云南人王秉心，那时他正在江湾劳动大学读书。我在昆明认识他的，一九二六年冬天，他在他家乡易门县办寒假义务学校，请我去教过一个月的书。我一九二七年的春天，要到缅甸去的时候，他那时要到上海去求学，便从他的路费中，给了我六七元钱。我在仰光的报馆当校对或做编辑，都曾注意过国内的刊物和报纸。看见他在劳动大学办的刊物上(名字记不起了)发表文章，估计可能是他，一通信，便接上了旧日的友情。我去找他，才知道他在宝山县泗塘桥劳动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学习。他马上给我在农民家租了一间屋子住，还带有一间灶房，一月租金只一元。自己煮饭吃，花五六元就够了。在农民家里住着既省钱，又安全，还可以坐下来写文章，不受干扰。我几乎天天都到劳动



大学农学院阅览室去看报纸。

王秉心是爱好文艺的，劳动大学有个拿波（Labor）剧社，他参加进去。演出易卜生的《玩偶家庭》，他扮演过赫尔茂那一角色。黄源以前的爱人许雨田，演娜拉。剧社还改编过都德《磨房文扎》中有关采干人的作品，王秉心也在剧里演过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他在解放后，任昆明花灯剧团团长，改名王旦东；文化大革命中，被人逼回家乡，含恨去世。我回国第一次看到上海的话剧，便是劳动大学的拿波剧社的演出，算是呼吸到祖国文艺的一些气息，鼓励我朝文艺工作那个方向走去。但没有多大信心。我托王秉心帮我找点工作。他说，劳动大学设在江湾的工学院，有个附属工厂，可能要招学徒工，但实际接洽的结果，只能得到失望。无事可作，还是坐下来写点东西。我在仰光便是这样做的，尽管稿费少得很，还可能养活自己。在热带地方，两套单衣就可以了，用不着棉衣棉裤和夹衣。随便给点钱，可以借裁缝的工作桌面睡一夜，被盖也是用不着的。到了上海，确实有衣食住的为难，但只能逼我努力写。我向《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投些散文去，以《缅甸漫画》为总的题名，描写异国的特殊风俗习惯。我用的笔名“荷裳”，其实是“和尚”的译音。我做过旅缅的华侨僧人万慧法师的学生，怀念他，便以和尚之名，作为一个纪念。文章登出了，可是去要稿费的时候，却象打发叫化子似的，丢给我一块钱。我当场撕了那张纸票，再也不向《时事新报》投稿了。现代书局出的《现代

文学评论》徵文要短篇小说，我投了一篇去。他们公布了应徵的前三名的作者，第一名王家械，第二名徐转蓬，第三名就是我。我的小说，是以新加坡为背景，写失业的华侨工人，谈矿工和海员的艰苦生活。三个人的小说，都没有登在《现代文学评论》上，而是出了一本小册子。我写信去要稿酬和一本登载我的文章的小册子，却完全不理。上海的出版商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当时也不曾出钱买他们出的小册子，至今我也记不起小说的题名了，作为投进大海中的一粒石子算了。

我无事可作，无职业可寻，总得写下去，消磨长天大日的夏季。写好了，不能不投出去。我向郑振铎编的《小说月报》送去一篇小说，至今犹记得题名《洋官与鸡》，因为后来收进了第一版的《南行记》。可是《小说月报》没有用，只用印好的退稿信和稿子一道寄回，表示“沧海遗珠”。这使我感到了挫折，但还是要写下去，因为题材一涉及到了过去的流浪生活，文思象潮水似地涌来，不能制止。再加我回到离开四年的祖国，耳闻目睹，总觉得比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还不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我从吴淞坐火车到上海北站下车，刚刚走过火车站的小小广场，进入窄狭的街道，突然有英国巡官带着印度巡捕、中国巡捕拦着我，浑身上下加以搜查，把人当成强盗看待。我在仰光、曼德里、槟榔屿、新加坡都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同时也感到在上海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英勇的，激

烈异常，使得英帝国主义一到节日，尤其是五一节，就胆颤心惊，如临大敌，必须出动武装，大事搜查，仿佛不如此戒备，他们的统治就会完蛋。我不能忍受下去，对于反帝这一重大战斗，一定要出把力，即使只在文字上表示一下，也是好的。这也增加我对写作的一些刺激因素。

在泗塘桥的农家住，看来是很安静的，由于睡房黑暗，便在有两道门的灶房里写作，一抬头便可以看见木槿花的篱落，和篱落外面一片青色的棉花田。真有砖灶铁锅，未能妨我襟怀，木槿棉花，亦足助人佳趣之感。但却也有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令人哀叹。我住的这个农家院子，约有两三家人，都有女儿到蕴藻滨纱厂工作，早上有几个脸色苍白的姑娘，做夜班回家休息，黄昏上班，便在田野中慢慢消失了她们的姿影。我最初还觉得这样的家庭很好，男耕女织，有农有工，真是难得。但在有一天下午，隔壁的一个老太婆来找我。手里拿一封信，要我唸给她听。她约五十光景，身体干瘪瘦长，满脸皱纹，神情凄凉。她有个独生女儿，在纱厂工作。丈夫看来早已去世，没有儿子。这家两母女悄悄静静过日子，很少听见说话的声音，更难看见她们脸上露出笑容。她先问我：“请告诉我，信哪里来的？”

我看了信封，便告诉她，信从福建厦门来的。她惊异地说：“我那里没亲没戚呀！”

我抽出信纸来看，开头写的是：“大娘台鉴，敬启者，鄙人乃宝山县人，在厦门认识令媛，托我转告……”我唸给她

听，文言句子，她听不懂，要我解释。我问她，你有女儿在厦门吗？

“没有呀！”她吃惊地睁大了凄凉的眼睛，接着又惊慌地问：“你快看看，她叫啥名字？”

我便把信全部看了，才告诉她女儿叫什么名字。她立即欢喜地叫起来：“对，就是她，她就叫这个名字。天哪，她五年前就不在了。那天，我还记得在下雨，早上等她，晚上等她，第二天又等她。人家做夜班的去了又回来，回来又去，就不见她啊。她爸爸到厂里去问，又到上海亲戚人家去问，哪里问得着呢？活活把她爸爸呕死！哎呀，我说这些干啥子？你快告诉我，她在那边干啥子？是不是，还是在纱厂做工？”

信上讲的，是写信的这个宝山人，在厦门做生意，到妓院去，认识一个妓女，了解到她也是宝山人，曾在纱厂工作，被坏人骗走，卖到厦门为娼。现在托人写信回来，希望出钱，买她脱离苦海。我看见老太婆那样欢喜，失踪几年的大女儿，居然有了下落。我望了她好久，不忍把女儿的苦难告诉她。但不告诉她，是不行的，女儿正要家里出钱救她哪。我终于告诉她，她一下惊呆了，随即痛哭起来。她回到隔壁屋里，还在低声啜泣地说：“饭都吃不起，还拿得出啥钱啊！”回国来，第一次看见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使我难过了好久，也永远不能忘记。我曾想过，不能解救属于此类人民的苦难，至少也得用笔描绘出来，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并有所激动。这件事情，由于对上海情形，不够深切了解，我一直没有动笔，

但却更加催促我去写那比较熟悉的滇缅边界人民的惨痛生活。我收入《南行记》中的《洋官与鸡》就在这个时候写的。

以后在北四川路上忽然遇见沙汀了，便搬进上海，同他一道住，还是继续写文章。除了同他一道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小说题材，并送作品去求教正而外，（我送的一篇，就是《太原船上》）我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夥伴》（收入《南国之夜》小说集，并选入《艾芜短篇小说选》）投交《北斗》杂志。作品没有登出，（以后同《北斗》主编丁玲同志谈起，她说，《夥伴》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故而不在于《北斗》发表。）但以后却来信，要我参加他们举行的《北斗》读者座谈会。会场是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的楼上。参加的读者只有三个人，除我而外，还有李辉英，当时他已有作品，得到《北斗》的登载。另一个是女的，大概叫朱曼华，她是否有作品在《北斗》发表，却记不起了。除读者三人外，就是一些有名的作家也来出席。有郑伯奇、丁玲、冯雪峰、叶以群（当时是叫华蒂）……等人。从此常有人来同我联系，来的最多的是覃晓晴（当时叫静子），还有彭柏山（当时叫彭冰山）。有时叫我参加一些群众性的会。记得有一次，是北四川路（也许是窦禄安路）的一个学校的教室，到的人不少，我也约沙汀去参加。会由郑伯奇主持，林焕平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即是“一、二八”事变以后，左联正

式把我排入小组，由茅盾、钱杏邨两位前辈和我组成。这使我不安，主要是我并没有发表过什么象样的作品，不能侪于作家之林。但也很高兴，我认为可以在文学方面，取得很大的教育。可惜茅盾同志忙于写作，未能参加，而阿英同志却和我在南京路的大三元广东餐馆内，相对饮茶，只讲当前的国内外的政治情形，从不谈到文艺思想和创作趋势。以前有人问我左联情况，我还忘记了，我还参加过顾凤城、谢冰莹他们的小组，组长还是钱杏邨。在这一小组学习不久，钱杏邨不约我再开小组会了。后来从旁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组长对我有些怀疑。我便去信给泰东图书局的钱谦吾（钱杏邨的另一笔名），表明我的政治态度。我在海外，没有读过什么政治理论，回到上海也没有钱买书看，只有一点简单的信仰。在国际上，拥护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国内，拥护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苏区。

钱杏邨没有回信，但丁玲却来找我，把我分配在另一个小组，和金奎光（朝鲜人）、杜君慧一个小组。出席来领导的，则是丁玲。每次开小组会，都是谈政治问题。在这个期间，我还有时间写作品。曾向《文艺新闻》投过两篇新诗。一篇是《扛夫的歌》，描写黄浦滩华懋饭店前面的码头工人。另一篇是《示威进行曲》，描写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文艺新闻》都登出了。我用的笔名是沙漠。由于知道刊物是左联的成员办的（当时我只知道编者是华蒂和适夷），就没有写信去要稿费，也没有索取刊物。左联的小组，很少谈

文艺，因此也不谈写了什么作品，发表了什么文章。只有沙汀一个人知道我用沙漠的笔名发表诗。

在《北斗》座谈会上认识的李辉英，知道他参加了左联，虽然不在一个小组，但却私人有些往还。他知道我有些短篇小说，便拿去两篇交曾今可编的刊物发表（小说的名字记不起了，可能有《洋官与鸡》）。因为曾今可编的刊物曾经披露过他的作品。小说发表之后，我同李辉英一道去会曾今可，当面问他要稿费，他硬推脱他的刊物印刷费都成问题，至于稿费一文也发不出。后来才知道他是“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这样的文人，靠办刊物不给稿费过日子的。

我在上海已快一年，投稿没有稿费，生活全靠缅甸的华侨友人募捐接济，也向上海的友人借钱过日。尽管意识形态方面，还是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而在日常的物质生活方面，远不如在工厂里做工的无产阶级。明知写的文章，赚不到钱，我还是写，因为既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了，总要使自己不要成为空头文人。

大约在这一年的夏天，丁玲要我去杨树浦工人区域工作。那里左联早已办了一个弄堂小学，叫做涟文学校。校舍只一间屋子，学生大都是工人的孩子，顶多二三十个人。晚间教室空了，变成男女工人补习学校，教他们识字。由此，在男女工人中，培养出一批能写作品的所谓文艺通讯员。这种工作大概叫做文艺大众化。因而，又要我担负文艺大众化委员会一分职责。我当时很高兴接受这一分工作，觉得去接近工

人,对我的思想的改造,以及了解产业工人的生活,充实我的写作,都是大有裨益的。原有的教员,是诗人风斯,他向我打了交待,便走了。

校长姓王,是湖南人,学校的课程,他全不管,也不教一点钟书。他只对付那些办学校应该对外的事情。左联每个月,给他八元钱,我同他商量小学一定要办好,让学生的家庭感到满意。他就把破旧的弄堂房子退了,另租一处干净的一楼一底的房子。还把做教室的客堂间粉刷一通,挂上许多万国纸旗。我和校长住在亭子间,再加上他的女儿,有十三四岁,正在纱厂做童工。前楼宽大一点,住满了单身女工。她们是从湖南乡下来的,在湖南人办的恒丰纱厂做纺织工作。后楼狭小,住了一个女教员,叫赵敏,也是湖南人。看来办这个学校,除左联出八元钱,还出一个尽义务的教员而外,还有另外的组织单位,也出了钱,又出了人。我没有问,也不好问得,只是白日黑夜教好书,同共事的人搞好关系。

白天教小学生是容易对付的。晚上的补习学校,可不好教。男女学生是纱厂工人,大都十七八岁,要从识字开始,没有一个可以很快培养成为文艺通讯员。这很使我发愁。我问他们在工厂里认识的工友,有没有人会写信,会看报纸的。也许他们交际不广,总是说少见这样的工人。

赵敏教了个把月,走了,又来一个叫周海涛的女教员,听说是长沙周南女校毕业的,湖南益阳人。经常戴副近视眼镜,一看就是一位教师。但对革命很热情,常常同我们夜



深出去贴标语，散传单，有时也在白天参加飞行集会，给追捕追赶的时候，也象男子一样飞跑，躲开警棍。她的丈夫叫陈鑑尧，江苏宜兴人，大家则叫他阿尹，是个搞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她的嫂子，记不起名字了，也是知识分子，在一家纱厂做工。嫂嫂的丈夫则在莫斯科学习。她的妹子，中学毕业的学生，正在设法进入绸厂做工。我开始认识了这个与工人接近的知识分子家族，接着更由他们的关系，认识了许多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的男女知识青年，有的已成为工人。他们是有写作能力的，要迅速发展工人文艺通讯员，我觉得他们是一部分重要的对象。

再加天天有人来找周海涛，他们知道我是左联派来的教员，又是做文艺通讯员的工作的，就有人自动地向我介绍，说他能写作品，或者说某个人会写文章。有个工人装束的人，对我说，他在《北斗》上发表过文章，署名叫匡庐。对于这一些线索，我当然要抓住。白天晚上教完书，利用深夜时间，或者星期天去找他们，要他们尽量抽出时间，搞一点文艺写作。为了这一工作，不只在杨树浦工人区域活动，还到梵王渡、曹家渡，以至黄浦江上游的周家渡。有个在工厂做杂工的魏辛，是能写作的，常用雪苇这个笔名写散文，后来我在苏州坐牢的时候，又在狱中遇见了他，才知道他在贵州早就参加了组织，他就是人家辗转介绍，同我联系上的。可以说，我所找的文艺通讯员，没有一个是从小童工出身的道地的工人。